



红旗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 目 录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二十周年……………齐 彦（3）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吴 畅（9）

评林彪的卖国哲学……………梁 效（12）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青 岩（18）

总结学习经验 推动学习深入

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学习深入……………池 恒（22）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25）

运用理论调查研究农村现状

……………中国共产党周口地委第一书记 江振华（29）

分工虽不同 都是主人翁…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理论小组（33）



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昆仑机械厂委员会 (35)

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湖南新邵县复员军人 刘克清 李解忠 李典庆
李维友 李国坚 肖坤书 (38)

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

.....柯 史 (41)

密切官兵关系的有效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会 (49)

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洛阳”舰党支部 (52)

发扬革命精神 做好革命工作

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靳志柏 (56)

破除外因论 自觉拒腐蚀.....江景宏 (59)

领导要敢于负责.....袁 青 (62)

科 学 史 研 究

实践是农业科学发展的源泉.....金 枫 (65)

杂文：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秦景池 (76)

☆八月一日出版☆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

——纪念《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二十周年

齐彦

毛主席在二十年前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是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篇重要文献，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系统地解决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今天，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重新学习这一伟大著作，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报告中所阐明的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光辉思想，对于我们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是非常重要的。

二十年前，我国广大农村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广大农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进行的又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要求彻底摆脱私有制的束缚，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迫切愿望。毛主席高度赞扬和支持了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对于农民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并号召全党放手发动群众，积极热情地领导合作化运动，“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



民共同富裕起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大海怒涛般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全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对这场生产关系的伟大变革，一切阶级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极端仇恨和恐惧。开始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刘少奇就极力鼓吹“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发展富农经济，并且把贫下中农积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革命实践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接着，一九五五年，当着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时，他又抛出了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叫嚣要赶快“下马”，大批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修正主义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主席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这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围绕着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展开的。土地改革以后，面对着农村中存在的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所有制这种基本情况，是领导农民继续前进，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听任资本主义发展，走向两极分化，使农民重新坠入困苦的境地，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以及我们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无产阶级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刘少奇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妄图把广大农民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农民表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积极性，战胜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取得了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广大农村又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和提高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国



民经济的发展。它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亿万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否就此结束了呢？当然不是。从农业合作化到现在，毛主席总是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因为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而忘记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忘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忘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主席还指出：“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事实证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企图复辟，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破坏活动。在农村，也还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条件和土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就代表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愿望。因此，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了，但农村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这个斗争，又是围绕着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是削弱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问题进行的。

在集体经济内部，无论是生产方针、经营管理还是收益分配上，都有一个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比如，在经营路线上，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重副轻农，弃农经商；在作物种植上，是服从国家计划的指导，还是搞自由种植；在产品销售上，是执行国家规定的政策，还是热衷于搞自由贸易；在收益分配上，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还是片面强调个人利益，不留积累，搞分光吃净，如此等等，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社、队都能够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有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单纯追求经济收入，作物自由种植，扩大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有的不按国家规定销售农副产品，甚至违反政策，通过自由贸易的渠道去卖高价；有的搞高工分、高补贴，扩大报酬差别。这些做法不仅腐蚀干部社员的思想，而且也往往为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开方便之门。上述情况说明，集体经济内部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势力往往会从内部来干扰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



能认为个体经济已经变成集体经济，小生产已经变成集体生产，就一定可以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了；相反，在集体经济内部还经常存在着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同时也不能认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正在逐步发展壮大，就可以放松警惕。搞得不好，偏离党的路线和政策，集体经济仍然会蜕化变质。

集体经济内部这些方面的斗争，是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分不开的。在农村，虽然已经建立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存在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仍属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行路线不正确，政策不对头，不认真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甚至有倒退复辟的可能。有的社、队由于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在分配方面，不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而是实行“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在交换方面，不是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的规定和指导，而是单纯追求收入的多少；在所有制方面，不是首先保证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而是任意扩大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集体经济的削弱。有的人就可能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通过合法的及大量非法的途径，捞取货币，并把货币转化为资本，投机倒把，放债剥削，发展下去，就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当然，如果离开今天农村的具体情况，想立即取消自留地，取消全部资产阶级法权，那也是办不到的、错误的。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是恰当地限制还是不断地扩大，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对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且要认真调查研究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生产关系诸方面的发展变化，不断地从总结经验中，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人民公社各级领导班子内部反映出来，实质上是执行什么路线，领导权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的问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就能认



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导农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集体经济就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果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就会把农民引向邪路，就要破坏集体经济。农村中某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地方，往往是同那里的领导班子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没有认真抓好两条道路的斗争分不开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一小撮阶级敌人对集体经济的进攻，不断变换手法，有的是利用某些基层干部欣赏资产阶级法权的弱点，进行腐蚀拉拢；有的则是通过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篡夺领导权，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如果被一小撮阶级敌人或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了领导权，那就要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大搞资本主义活动，使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有名无实，蜕变为“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

因此，我们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要抓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抓好对社、队干部的教育。应当肯定，我们的社、队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部分同志身上，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小生产的某些心理和习惯。如不警惕，是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腐蚀侵袭，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对这些同志，主要是通过组织他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实践经验，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从路线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社、队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就能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保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引用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进一步指明了，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改造小生产者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个体经济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对农民还必须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广大贫下中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对头，他们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在党的教育下，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是工人阶



级可靠的同盟军。但他们中间的某些人还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小生产的某些固有特点，还会受到资本主义的侵蚀。至于一部分富裕农民，在党的教育下，虽然也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但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总想利用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进行投机活动。这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在农民身上的反映。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教育农民，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小生产者的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进行这种工作时，我们既要看到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又要看到农村中社会主义的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既要充分认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充分相信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对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一定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正面教育，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引导他们自觉地同小生产的习惯和影响彻底决裂。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如何正确对待农民中各个阶层的无产阶级政策，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坚持。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农村的各项工作就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发生了偏向，也较易发觉和纠正。

二十年前，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贫穷落后的旧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广大农村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基本完成到彻底完成，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任务还很艰巨，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还不高，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进行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我们要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学一点政治经济学

吴 畅

为了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正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紧密结合实际，学一点政治经济学。这个学习很有意义。不少地方还同专题调查相结合，学得生动活泼。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不仅政治思想方面还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条件，而且在经济方面仍然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这主要是指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等。对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问题，要弄清这些问题，不能不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把这些问题弄懂了，就可以更好地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精神实质，更深入地理解“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关于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都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运动规律中得出来的科学结论。列宁说：“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从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新事物中总会有旧的残余。因此，我国现在还必须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

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跨过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虽



然在不同的所有制下它们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但是，商品、货币的基本属性和特点总是差不多的。例如，商品具有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小生产会发生分化，不断产生出资本主义，等等。按劳分配的情况不同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但是，由于它“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从这一点看，也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就需要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有些同志说，我们整天跟商品打交道却不懂商品制度，整天跟钞票打交道却不懂货币交换，整天跟工资打交道却不懂按劳分配，看不清这些东西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根源，真是太危险了。这是很深刻的体会。

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经济规律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跟旧社会相比，“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当我们研究我国现有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的时候，仅仅认识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看到它们所反映的是跟旧社会不同的生产关系。就是说，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要以这些原理为武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它的规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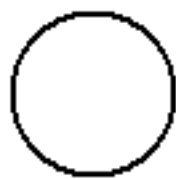
除了认真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以外，我们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作了系统的阐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所作的全面分析，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提出的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的重要论断，不仅对修正主义理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改变了我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的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片面的、



形而上学的观念，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我们认真学习和弄懂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理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什么对某些资产阶级法权既要承认它的不可避免性，又需要加以限制。从而也就可以深入理解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分配和交换领域的具体表现，以及它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的具体规律性。并且“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 and 控制的适当（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方法”，即应当从哪些方面和哪些环节去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多年以来，毛主席关于学习政治经济学、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我们也应当结合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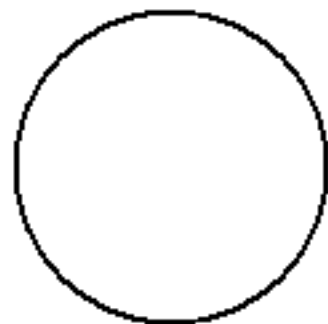
政治经济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披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我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必须有鲜明的目的，必须有的放矢。在当前，主要是为了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是为了同修正主义作战。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中，总是从理论上歪曲马克思主义。苏修叛徒集团也千方百计地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学一点政治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上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有利于识破修正主义的反革命实质，并同它作坚决的斗争，夺取胜利。从一些单位的学习经验来看，凡是紧密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的，紧密结合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学习的效果都比较好。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政治经济学正从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日益变为广大工农兵手里的尖锐武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不仅愿意学，而且学得很好。他们说：“政治经济学讲的是我们切身的事情，过去说不好学，现在一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结合实际来学习，就比较容易懂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上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就一定会转化为反修防修、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强大的物质力量。



评林彪的卖国哲学

梁 效



我们中华民族热爱独立自由，富有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光荣传统。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祖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始终没有停止过。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政权性质的根本变化，这种斗争同社会主义时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相联，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对内搞复辟、对外搞卖国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教员。这个地地道道的孔孟之徒把孟轲的“小国师大国”的谬论，奉为投降卖国的理论根据。

是不耻受命，还是起来革命

“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孟子·离娄上》）小国、弱国事奉和服从大国、强国，应该象弟子听命于先师那样，俯首帖耳，不以为耻。这完全是投降有理的反动谬论。事隔两千多年，林彪又老调重弹，把孟轲这一句话收在他们拼凑的“四书集句”中，张贴在办公室里作为座右铭，赞赏备至。

林彪心目中的“大国”就是美苏两霸，首先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他把超级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说成是“先师”和“弟子”的关系，极力掩盖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本质，这就充分暴露了他的卖国贼嘴脸。

列宁指出：应该“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少回山河破碎，多少次丧权辱国，多少



户家破人亡！我国人民从近百年的切身历史经验中，深刻认识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国对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师”，而是把他们推入火海深渊的罪魁祸首，是他们最凶恶的敌人！

今天，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美苏两霸都极力用不同方式想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他们各自的控制之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装出一副“良师益友”的面孔，到处招摇撞骗，推行其霸权主义政策。什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呀，什么“军事、经济援助”呀，又是派人，又是借钱，“经验”、“理论”一应俱全。可是，谁要请它来为“师”，那就是引熊外婆进门，灾祸临头，苦不堪言。请它当“老师”么？它就要当老子，骑在你脖子上作威作福。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径，激起了第三世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林彪鼓吹“小国师大国”，反对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妄图把我国变为苏修的殖民地，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无耻叛卖！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帝国主义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却的地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明争暗夺，乘机进行扩张。具有丰富反帝斗争经验的各国人民一定会识破超级大国的阴谋诡计，警惕和防止“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使他们的侵略扩张政策不能得逞。

对于侵略成性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不耻受命还是起来革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我们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一样，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命”，剥削之“命”，是从来不受的！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继承和发扬了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赶跑了帝国主义，迎来了解放胜利的春天。解放初，当美帝把侵略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我们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六十年代初，苏修叛徒集团发动突然袭击，反华反共，撤专家，毁合同，搞颠覆，施加种种压力，妄图逼我“就范”。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紧反华。“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我们狠狠顶了那个俄国教师爷，坚决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打退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挑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仅掌握了原子武器，还把高奏《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万里长空，大



灭了核霸王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这就是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国强加之“命”的最好回答！

林彪居然厚颜无耻地指责中国人民反对超级大国的斗争是“耻受命”，而却把他自己投降卖国当成是最大的光荣。按照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苏修这样的超级大国只能“师”，不能“顶”，只能“受命”，不能“抗命”，如若不然，就是违背了“小国师大国”的孔孟之道。这完全是投降派的逻辑、卖国贼的哲学！

驳“卖国安宁”论

“能以小事大国乃宽”，这是林彪亲笔写下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小国只要事奉大国，弱国只要屈从强国，就可以得到安宁。

好一个“卖国安宁”论！

这个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存在的世界能够安宁吗？不能。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要对外进行侵略的，总是要剥削和奴役愈来愈多的国家的，哪里能让他们“安宁”？今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狭路相逢，在全世界展开激烈的争夺。他们争夺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动乱。他们有时也进行一些暂时的勾结和妥协，但这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他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战争。美苏争霸是今天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当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深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日子也很不好过，它对外乞讨，对内赖债，处于无法解脱的困境。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总是要力求转嫁危机，从战争中寻找出路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正在走希特勒的老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则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现在，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是帝国主义互相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

以小事大、以弱事强是根本得不到安宁的。中国历史上那些投降派称臣纳贡、奉献子女玉帛，何尝得到过什么安宁！近代史上，从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



石，一个个崇洋媚外的卖国能手，在丧权辱国的“卖身契”上签字画押，割地赔款，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一再蹂躏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哪里有什么安宁！

再看看苏修的那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吧，那便是对这种安宁论的绝妙写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等种种枷锁，把它的所谓“兄弟国家”禁锢在“大家庭”的铁丝网里，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克里姆林宫的新沙皇以老子党和宗主国自居，在别人的国土上派驻重兵，侵犯主权，干涉内政，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这就是它带来的“安宁”！它实行高度垄断，推行所谓“国际分工”，把一些国家变成它的畜牧场和果菜园，把另一些国家变成它的加工工厂和原料基地，肆意掠夺“大家庭”各国人民，这就是它带来的“安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它可以为所欲为，而别人稍不如它的意，那就祸从天降，它不惜动用重兵，镇压爱国人民的抵抗，整个国家就被占领。无数事实证明，以小事大，以弱事强，得到的不是什么安宁，而是民族的屈辱、国家的沦亡、人民的苦难。

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只能靠各国人民的斗争，而不能靠向帝国主义乞求。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超级大国，而是属于人民。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辉煌胜利，为小国、弱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大国的侵略，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只有从地球上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世界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幸福和解放。

拿“原子”是假，卖国是真

“原子拿到再硬”。没有原子弹就只能事奉核霸王，这是林彪“小国师大国”投降卖国路线的又一个根据。

在超级大国对我实行核垄断、核讹诈的情况下，是打破核垄断，还是屈服于核压力，充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两条路线的对立。早在一九六三年，林彪一伙就匍匐在苏修这个核霸王膝下，恶毒攻击我党的反修斗争是“羽未丰想飞”，假惺惺地说什么“原子拿到再硬”。似乎没有核武器，就应该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原则，跟着苏修的指挥棒转；就应该出卖国家主权，屈从核霸王的奴役和控制。这是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卖国理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在帝国主义手中，只不过是吓人的纸老虎。我们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核武器，决不屈服于超级大国；我们有了核武器，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其实，“原子拿到再硬”，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请看，当我们不仅有了原子弹，而且有了氢弹，林彪又怎么样呢？一九七一年，在那个《“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他恬不知耻地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供认不讳地要把苏修作为他们一伙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靠山。可见，林彪这伙卖国贼想的根本不是什么拿“原子”，而是如何搞复辟、找后台、卖国求荣。林彪的阴谋一旦得逞，我国就会沦为苏修的殖民地。那时的林家王朝在社会帝国主义脚下，只能是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半分钟也离不开主子的输血打气，又哪里能“飞”得起来、“硬”得起来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拥有独立经济都不允许，根本不会让他们独立掌握原子武器。即使象当年李鸿章依靠帝国主义办“洋务”、造“洋枪”那样，依靠社会帝国主义的残羹剩饭，爆炸一个洋里洋气的核装置，也是照旧离不开洋大人的核保护伞的。

林彪的“小国师大国”、“以小事大国乃宽”、“原子拿到再硬”等民族投降主义谬论，都贯串了一条黑线：畏敌如虎，害怕帝国主义。这同他在国内阶级斗争中，从散布“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论调，到东北战场上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害怕与敌人决战的阶级投降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林彪的卖国主义，集中表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特征。正象毛主席当年批判蒋介石一群卖国贼一样，“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

叛国投敌，引狼入室，这是历代反动派的故伎，也是儒家卖国路线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那些反动的政治势力，推行儒家路线，搞复辟倒退，他们尽管拥有权力和财富，但是却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他们在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垂死挣扎，他们在垂死挣扎的时候往往要借助侵略势力。但是，他们表演得越充分，就越是迅速、彻底地遭到人民唾弃。林彪也没有违背这个规律。



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批修整风运动不断深入，林彪一伙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迅速败露。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在叛逃前，林彪口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重耳在外则安，申生在内而危”。晋文公重耳是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人物，林彪这个反革命小丑自比重耳，当然是可笑的。但是，这却充分暴露了他贼心不死，梦想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凶相。他妄图投奔苏修，依靠社会帝国主义的刺刀和坦克，把中国人民淹没在血泊之中，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折戟沉沙，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批判卖国主义，埋葬洋奴哲学

林彪“小国师大国”的理论破产了，苏修颠覆我国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远没有结束。批判刘少奇、林彪投降卖国、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扫除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垃圾，清除修正主义流毒的斗争，必须长期进行下去。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屈辱。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能够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而且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各国人民之间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援。我们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主动地有分析地吸收对我国有益的东西，但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我们引进一些外国的比较先进的技术，是为了借鉴，为了更快地赶上，绝不是跟在别人后面爬行。如果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一切依赖别人，就会丧失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近百年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环顾当今世界，美苏两霸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进一步清算林彪的卖国哲学，不仅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而且必将大大振奋无产阶级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更好地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

青 岩

在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指引下，广大群众和干部正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促进安定团结，开展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并以这种斗争为动力，抓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种革命形势，要求我们的党进一步加强团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带领广大群众和干部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加强党的团结，对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五十四年的历史证明：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团结，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里既讲了党的团结和群众团结的关系问题，也讲了党的团结和群众团结对于完成革命任务的重要性。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仍然感到很亲切。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要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必须依靠广大群众齐心协力地去战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怎样才能使群众团结起来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呢？首要的问题在于加强党的团结。要靠高度集中的统一的党去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广大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党的状况如何，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



各地实现安定团结的经验证明，只要党内真正团结起来了，就会促进群众的团结。党内在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群众中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我们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

社会主义时期是由资本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现在我们党领导群众所进行的一切工作，不论是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转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复杂的。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阻止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总是要通过拉拢、腐蚀等各种办法，分裂我们的党，在我们党内寻找和培植他们的代理人。他们还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的进攻。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旧的习惯势力，也在经常地浸染着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必须加强党的团结，“**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恩格斯致卡·特尔察吉》），即带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只要党的团结加强了，就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克服资本主义倾向，有力地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如果党的团结涣散，就会给阶级敌人分裂我们的党造成可乘之机，势必削弱党的战斗力。

为了不断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必须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论联合政府》）这是当前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组织应该把这项工作切实地抓起来。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统一的纪律必须坚决执行，以保证上下一致，全党一致。每个党员，每个党的干部，都要做团结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都应该谦虚谨慎，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主动做好团结的工作。特别是各级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使“一班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应该看到，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是加强党的团结的关键。“**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各级党委要着重



自己的领导责任，讲路线，识大体，顾大局，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一切无原则的纠纷，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清除干净，积极搞好团结，使“一班人”步调一致地为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

要加强党的团结，必须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党内并不是没有矛盾了。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我们的党就是在解决矛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长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从而形成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尽管各级党组织内部存在着的矛盾情形不同，但说到底无非是执行什么路线、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是不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和按革命原则办事的问题。一部分党员中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包括资产阶级派性，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结果，是影响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因素。我们对这些东西决不能姑息放纵，一定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要通过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有人怕影响党内团结，怕影响“一班人”的关系，怕影响上下级和同志之间的关系，对某些党员、干部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去抵制，不去斗争，不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是极其错误的。许多地方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但不会损害党的团结，而且会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相反，如果听任错误思想和不正派作风自由泛滥，就会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某些党员在生活上腐化起来，在政治上堕落下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顺利贯彻，那是不可能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反对自由主义》）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原则，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当然，解决党内矛盾要有正确的方法。应该看到，党内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说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缺点和错误的人，就是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那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多数也能够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在党组



织的批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改正错误。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路线觉悟，认清错误的危害和根源，积极改正。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整顿党的作风》）

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这是加强党的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我们的纲领》）有了思想理论上的一致，才会有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习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如何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这样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共同的目标，真正能够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致。如果理论上糊涂，对于实践中的问题说不清楚，看不透彻，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是共产主义原则，甚至在工作中把对的当成错的，把错的当成对的，这样，在党组织中，在党委“一班人”中，必然要产生分歧，**搞不好团结**。只要产生修正主义，就会出现分裂主义，这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规律。要加强党的团结，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深入开展对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肃清其余毒。这是长期的任务，必须坚持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指出，加强党的团结，目的是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中，是不是充分发挥了党的战斗作用，这是考察党组织是不是真正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各级党的组织、全体党员和干部，要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同的目标，团结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总结学习经验 推动学习深入

理论联系实际 推动学习深入

池 恒

下面几篇文章，是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如何运用革命理论，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总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具体经验，也反映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进一步深入。

我们的学习能不能不断深入，决定于我们是不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思想原则。凡是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认真看书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努力将学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去，就能使学习逐步深入。相反，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或者把理论学习停留在书本上，只是进行抽象的、一般的议论，就会觉得学习深入不下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运动，掌握它的发展规律，从而指导我们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反修防修斗争，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我们要充分认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重大意义，看到全国人民在“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巨大的社



会主义积极性，克服那种认为已经学得“差不多”的思想，树立长期努力学习的思想。从这几篇体会文章可以看出，认真按照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指示去做，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又在实际斗争中学习理论，就会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产生多么大的变化，革命工作得到多么有力的推动啊！

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可以使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新事物中总是带有旧的残余。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正是在社会内部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的斗争中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长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是要具体地、实际地去认识、揭露和分析这种社会的内在矛盾，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采取正确的措施，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的东西战胜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动社会前进。毛主席正是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主席的指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辩证发展的规律，为我们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法权作了原则规定。有的体会文章讲了他们是怎样看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明为什么既要承认它，又要限制它，那种企图一下子就全部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或者对它不加任何限制、任其扩大的想法，都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有的体会文章探讨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恰当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同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一致性，包括同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的一致性。这样的学习，就比以前更深入了。我们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要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有关无产阶级对



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具体分析，以此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开展以来，广大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提高；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倾向、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更加自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促进安定团结，更加主动。在这方面有着大量的动人的事迹。我们要总结经验，要善于用干部、群众自己的切身体会引导学习不断深入。象几篇体会文章所反映的那样：我们的干部，掌权不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们的工人同志提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响亮口号，推动生产迅速发展；一大批复员军人到农村，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而贡献力量，等等，这都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所带来的丰硕成果。最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团结战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成果。所有这一切，再一次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对于能不能有效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土壤，有着重大的作用。革命的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毛主席在讲到搞清楚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要使全国知道。”这就是说，全国人民如果都提高了认识，积极地参加反修防修的斗争，自觉地抵制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有了可靠的保证。因此，继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仍然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需要进一步抓紧抓好。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北京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党支部和全大队贫下中农一道，运用革命理论，对我们大队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体会到，要使集体经济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最根本的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积极的态度和辩证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

我们有的同志曾认为，生产水平低，集体家底薄，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限制不了；生产发展了，集体家底厚了，它就自然受到限制。我们大队十几年来来的经验说明，能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在于生产水平高低，也不在于集体家底厚薄，而在于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大队年年有几十名强壮劳力外出烧窑看火，抓现钱；一部分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较严重的人，也争着外出搞副业。结果是“抓了钱，荒了田，散了心，离了线”，生产搞不好，粮食亩产平均三百来斤。集体越来越穷，少数人却越来越富，出现了新的两极分化。一九六八年，成立了新的党支部。论条件，还是那个薄家底。但不同的是，党支部带领广大社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纠正了以副伤农的错误倾向，集中人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路线端正了，资产阶级法权得到了限制，革命和生产出现了新局面。一九六九年粮食亩产过“长江”，一九七一年超千斤，去年又达一千二百六十斤；农、林、牧、副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公共积累和集体储备粮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



验，使我们很受启发。不是“生产水平低，集体家底薄”就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相反，正是由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进行限制，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使集体生产不发展，集体家底越来越薄。而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克服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怎样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结合农村的情况来看，就是要认真执行党关于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党关于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政策，反映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是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既承认、又限制这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如，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党的政策是：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家庭副业的产品，除一、二类物资外，其他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但又规定尽量使家庭副业和集体经济或国营经济联系起来，并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这些政策规定，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一致的。不认真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一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想马上取消它；或者一讲不可避免，又不对它加以“限制”，这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

总结我们大队的经验，是不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关系很大。我们安排农业生产，一般都是在上级党委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的。但在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还在起作用，货币也在起作用，如不加以限制，就会滋长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种植，反对自由种植；坚持把产品交售给国家，反对自由出售和变相私分。如我们大队曾有人主张减少粮食用地，扩大菜地，把菜拿去卖高价，或者分给社员，让社员跑自由市场。我们党支部反对了这种意见，坚决把党的政策“关”，限制了利用价值规律搞自由种植的资本主义倾向。当然，抓住了粮食这个纲，也不能忽视全面发展。前几年，我们粮食增长的幅度较快，但对全面发展注意不够，例如养猪事业就发展较慢，结果，一些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的富裕户，就钻了



这个空子。他们专养母猪，下了小猪卖高价，光这一项就超过了他们从集体得到的收入。而有些社员却因为小猪贵，买不起，养不了。后来，我们加强了集体养猪场的工作，保证了对社员的仔猪供应，并对仔猪价格作了一些规定，限制了“自由贸易”的资本主义倾向，而且使全大队养猪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猪多了，肥料也多了，这就为粮食进一步增产创造了条件。这件事情深刻地告诉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要削弱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而是要更好地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几年来，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限制，不仅粮食上去了，而且其他方面也有很大发展。

在农村，还要很好注意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正确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过去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劳动力的强弱、男女区别，因而，工分等级烦琐，级差很大，引起一些人争工分、争待遇，造成社员的实际收入差别很大。在学大寨运动中，我们改进了工分制度，劳力虽分等，但等级不多、级差不大，坚持男女同工同酬，对年老体弱和学生的工分作些适当照顾，对技术性较强的工种，虽有照顾，但不搞高工分、高补助、高提成。我们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启发社员自觉地劳动上。这样做，缩小了社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使得劳力少而人口多的户尽可能逐年增加收入，这几年，全大队没有一户超支的。这有利于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树立大家共同富裕的思想。在分配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公共积累。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我们不能顾私不顾公，有钱都分掉，形成三级所有两级空。过去，我们有的生产队，尽想给社员多分钱。有的社员手里钱多了，就惦着盖房子；有些劳力少没有钱的户也要盖房子，就东找西借拉亏空，造成生活困难。个人盖房还要跟集体争劳力，争农时，争土地。这几年，我们增加了公共积累的成份，准备分期分批由集体盖社员住房。这样做，对干部和群众教育很大，大家都感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搞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解放二十多年来，农民虽然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其固有的、小生产者的某些特点还有所表现。尤其是一些富裕农民，在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强烈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向广大社员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近年来，我们建立了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办起了农民政治夜校，组织社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引导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我们还建立了“评论会”制度，发动群众宣传好人好事，结合实际批判种种私有观念，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干部必须带头。如有的干部借口工作多、担子重，要求给点特殊照顾，有的干部不能以平等态度待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较少，等等，这些都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都必须坚决反对。要不，就会脱离群众，破坏干群关系。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要干部不搞特殊化、不吃请、不受贿。严格要求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不能假公济私，借职权方便侵占社员的正当利益。第二是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反对做官当老爷。我们大队的干部不管多忙，都要挤时间参加劳动。党支部尽可能不占用生产时间开会，为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第三是发动群众参加管理，经常开门整风，对干部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评和帮助。干部也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认识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直到最后消灭它，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需要我们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只是初步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会更尖锐、更复杂。我们党支部决心带领全大队社员群众，继续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奋斗。



运用理论调查研究农村现状

中国共产党周口地委第一书记 江振华

毛主席一贯提倡“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组织地、县两级的主要领导同志带领几百名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指针，开展了对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现状的调查研究。

我们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国农村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是，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很复杂的。对于老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捣乱和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但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认识，仅仅看到这个方面还不够。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当前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虽然是做农村工作的，长年在农村跑，经常同农民打交道，而对小生产经常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却不清楚，因此，见到了一些现象也不能深刻地加以认识。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又到农村一调查，在这方面的感受深刻得多了。大量的事实表明，实现合作化以后，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不断提高。但是，在现阶段的农村中，私有制经济的残余还存在，农民还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某些固有的特点，特别是富裕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很严重的，的的确确，每日每时都在那里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做农村工作的同志，如果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搞清楚，就抓不住农村工作的要领，就不能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常不断地狠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里形成了浓厚的私有观念，尤其是富裕农民，他们过去礼拜赵公元帅最勤，向往个人发财致富。集体化了，但赵公元帅的灵魂不可能一下子在他们的头脑中消失。而这正是导致他们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内在原因。因此，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对广大农民的教育和改造。针对小生产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觉地和大量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

通过调查，我们还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富裕农民把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变成现实，主要是靠扩大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实现的。比如，有的违反政策规定，任意扩大自留地，搞副业单干；有的利用按劳分配中的不平等，追求高工分；更严重的是利用商品交换，集市贸易，弃农经商，搞投机倒把活动。他们中间的少数人不仅利用某些地方暂时物资供求不平衡和地区差价，倒卖农副产品，套购国家计划物资，高价出售，牟取暴利，而且有的还组织地下包工队，进行变相的雇工剥削。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就是这样产生的。

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在农村中的任何地方和社队都是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的地方和社队能够泛滥起来，而在另一些地方和社队却受到批判和抵制，这决定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毛主席说：“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毛主席这一指示也符合农村的情况。我们在调查中看到，农村的一些后进单位，资本主义所以能够泛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



手里，资本主义活动没有受到打击；同时，如果领导班子不坚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得力，也会给资本主义以活动的机会。而在一些先进单位，资本主义所以得不到发展，这并不是因为那里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而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坚强有力，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经常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打击资本主义活动，使一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无机可乘。事实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单位走什么道路，性质变不变，关键在领导，根本在路线。这就提醒我们要十分重视解决农村基层单位的领导权问题。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还体会到，在农村搞调查研究的时候，要学会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否则，就不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的关系问题。有的同志看不到两者的统一性，在思想上行动上时而发生摇摆。如果看不到资产阶级法权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看不到必须对它加以限制的一面，而只看到还允许它存在的一面，就会导致它的扩大化，从而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反之，如果只看到必须对它加以限制的一面，而看不到还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面，想一下子把它全部取消，也不符合党的现行政策。对于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也要作全面分析，首先要看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极少数人的确可能或者已经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少数后进的社队来说，领导班子状况也不相同，即使是问题严重的单位，真正的坏人也是极少数。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就不能正确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解决农村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达到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改造小生产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指出：“对于这种人不能



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回顾我们长期在农村工作的经验，深刻体会到列宁的教导完全正确。改造小生产者，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需要经过很长的时期，操之过急不行。对于广大农民，我们只能坚持正面教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他们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从政策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削弱滋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则必须予以坚决打击。我们一定要相信，只要经常不断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就能够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能够引导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几个月来，我们地委的领导同志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调查研究农村阶级斗争的现状，使我们对小生产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搞得比以往清楚。对于自己原来那些似懂非懂的问题，也能说出一点道理来了；对于怎样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也开始有些体会了。这就启示我们，许多问题，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它搞清楚。当我们坐在机关里，根据一知半解，凭“想当然”，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打不出什么好主意，就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当我们转变作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大搞调查研究，就使我们学习的面貌为之一新。“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逐步做到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力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不断把学习运动引向深入。



分工虽不同 都是主人翁

上海第五钢铁厂第一车间理论小组

不久以前，在我们车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个炼钢小组安排一位四炼钢手去当六炼钢手，这位同志认为，六炼钢手干的是“下手”活，四炼钢手干六炼钢的活是“坍台”，不肯干。

当了四炼钢手为什么就不能再干六炼钢的活？为什么觉得当六炼钢手就是“坍台”呢？说起来大有缘故。

我们电炉炼钢，原来就有从一炼钢手到六炼钢手的各种区别。一炼钢是炉长，二炼钢是副炉长，三炼钢顶班，四炼钢管原材料，五炼钢管工具，六炼钢挂料斗、翻渣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明文规定：六级工才能当炉长，三级工才能上炉前。从六炼钢到一炼钢，根据技术考核，论资排辈，逐级提升。一级只能干一级的活，“下手”只能听“上手”的话。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清规戒律冲破了。但是，旧的影响依然存在，有些人还是用旧的等级观念来看待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工：“一炼钢高人一等，六炼钢低人三分”、“组长说了算，组员跟着干，翻渣包的靠边站”。这种陈腐的等级观念，对人们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有些同志当了所谓“低级工”，便认为是“倒霉”、“坍台”，影响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有些同志当了“上手”，份内工作做完了，也不愿帮“下手”干活，怕“不光彩”。在其他行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什么“七十二行，钳工为王”，“技术工种吃得开，食堂工人没出息”，等等。显然，四炼钢手不愿干六炼钢的活，联系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分析，实际上隐藏着的是由于旧的分工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在作怪。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助长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本位主义，影响到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完善，使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在旧社会，分工和等级往往是密切联系着的，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劳动人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解放以后，“所有制变更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与此相联系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等级制度也同时遭到了否定，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



主义的相互关系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而自然形成。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存在着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等。因此，在“分工”这个问题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痕迹。

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凝固化不行，加以扩大更不行。但是，不要分工也不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是必不可少的。就拿我们炼钢来说，一个炉座总要有个头，要有人指挥，有人操作，有人当一炼钢手，有人当二炼钢手，有人管材料，有人管工具，有人翻渣包。没有这种分工，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社会主义生产就无法进行。在整个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工作岗位的差别，但不管什么工作都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螺丝钉。因此，对由于旧的分工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进行分析，既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不可避免的一面；既要承认它，又要限制它。在限制的措施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破除那种“工种分高低，职业论贵贱”的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破除得越彻底，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越能得到限制。

破除等级观念，要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车间的工人说得好：“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在这个口号下，原来不愿再当六炼钢手的同志，认识到“革命工作千万种，种种都是为革命”，现在不仅安心六炼钢工作，而且还关心全组工作。炉长和副炉长，也主动去干六炼钢的活。过去炼钢都是组长说了算，现在实行生产民主，大家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这个小组已经成为一个团结战斗的先进集体。“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的口号，使人们冲破了分工的狭隘眼界。工人们破除了“分工如分家，隔行如隔山”的旧观念，树立“全局就是岗位”、“想全局、急全局、千方百计为全局”的新思想。不仅在一个小组之内，在组与组、班与班，这个工种与那个工种之间，也都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份内工作拼命干，份外工作抢着干。连配电工、行车工、化验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纷纷支援炉前工作，打“团体赛”，炼“风格钢”。过去调换一个炉壳，两个机修工人要操作三、四小时，现在炉前工人和机修工人积极配合，齐心协力打歼灭战，以八分半钟的速度创造了调换炉壳的新纪录，大大缩短了停工时间。由于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破除了等级观念，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完善，干部群众团结战斗，革命和生产都出现了新的气象。今年上半年，我们车间的钢产量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七，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正确处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昆仑机械厂委员会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如何在处理人们之间特别是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经常注意研究解决的问题。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自觉性，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有了些初步的体会。

社会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一种阶级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由原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在劳动人民内部建立起了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就没有什么矛盾了。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看问题，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着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这些东西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反映到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来。因此，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必须注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领导同志尤其要注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调整好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但又反作用于所有制，在一定条件下还起决定作用。就拿我们厂来说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推行的“一长制”、“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厂内搞得等级森严，干部同群众有许多不一样。广大群众当家做主的思想得不到发扬，影响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修正主义路线和等级观念受到了猛烈批判，领导同群众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领导和群众同学习、同劳动、同商量，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断高涨，革命步步深入，生产持续上升。全厂连续五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年平均产值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今年上半年，已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一，比去年同期



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三。可见，搞好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直接联系着的，是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直接联系着的，有利于把广大群众团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我们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反复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战争年代，环境那样艰苦，革命队伍内部军民关系，官兵关系是那样团结一致，水乳交融，而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今天，有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反而疏远了，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资产阶级法权迷住了眼睛，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贪图享受、要求特殊的思想也就多起来了。那种所谓“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观点，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有了这种思想，就觉得享受一点、特殊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应该计较什么功劳苦劳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职务高了，薪水多了，因而更加谦虚谨慎，更加注意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发扬革命传统，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这才是共产党人、革命干部应有的态度，这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近几年来，由于我们比较地注意在这方面教育干部，要求干部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功劳大小，不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都要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及各项规定。凡是要求群众遵守的，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几个主要负责干部，除年老病弱的同志外，上班下班都不坐小汽车，和群众一道，脚踏自行车，同走一条路，共叙知心话，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鼓励。

因为我们是领导干部，掌握一定的权力，这就会有人来给予我们一些特殊的照顾。在我们厂就曾发生过这种情况，一次，后勤部门把厂内照顾病号的白面，拿一部分来照顾厂内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面对这种事情怎么办？是心安理得，习以为常，还是严格要求，不要这种照顾？我们采取了后一种态度。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只能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不能把职权当成特权，用来为个人谋私利，徇私情，享受特殊照顾。我们应当分析一下，如果这种照顾是出自群众对领导的关心，就要说服群众去关心更多的同志。如果是有人想利用照顾领导来为他个人换取好处，更要坚决抵制，并予以批评教育。即使有些照顾从制度上讲是可以的，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那样，就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我们的远大目标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办



到。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当干部的要带头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要多吃点苦，多操点心，多一点自我牺牲精神。这样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真正体现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职工群众出于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经常对我们的领导工作提出一些批评建议。这正是领导和群众的新关系得到发展的生动体现。如何对待革命群众的这种批评建议，也有一个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问题。过去我们有的同志对上级的批评听得惯，对群众的批评听不惯，对表扬的话觉得顺耳，对批评的话感到刺耳，这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地位。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有权对企业的领导实行革命监督。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使社会主义企业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是同志的关系，群众对我们提出批评，正是对革命、对同志的关心。即使有些意见刺耳，但能帮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一个时候，由于我们自恃高明，放不下架子，采取了压制群众批评的错误态度，结果一度偏离了正确路线，干群之间产生隔膜，挫伤了一部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树立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对群众提出的不同意见，首先听完，进行分析，正确的接受，不正确的耐心解释；同时，还采取开门整风，坚持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等措施，向群众学习，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有事同群众商量，因而密切了干群关系。群众心情舒畅，有话当面讲。今年春节期间，有的车间采取多发加班费的办法，工人群众就及时提出了批评，帮助干部提高了路线觉悟，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只要我们领导同志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把群众放在自己的心目之中，从政治思想上帮助群众，从生活上关心群众，就能够进一步发展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这就要求我们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中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对群众中的缺点、错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对职工的生活问题，如住宿问题、吃饭问题、文化生活问题、疾病问题、小孩入托和教育问题，以及家属来厂接待问题等等，一切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时刻关心，积极创造条件，尽可能地妥善办好。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因而在全厂范围内正在出现干部关心群众，群众爱护干部，干群一条心，团结向前的生动活泼局面。



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湖南新邵县复员军人 刘克清 李解忠 李典庆
李维友 李国坚 肖坤书

四个多月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根据革命的需要，从北京部队某部八连复员，回到了家乡湖南新邵县农村。离开部队之前，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识到：复员战士回农村去，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很有意义。当时，我们和全连复员战士一道，写了《回到农村 继续革命》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今年第四期上，向党表示了扎根农村，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几个月来，我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壮志，投入了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回到农村干革命，这条路子走对了。

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向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壮大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全党办农业的方针，号召各行各业要支援农业，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是我们革命战士应尽的职责。

我们回到家乡，放下背包参加劳动，贫下中农无不表示热烈的欢迎。他们高兴地说：“你们回来给队里增加了生力军，往大办农业上添了力量。”这使我们很受鼓舞。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汇进了农村战天斗地的革命洪流，也就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今年春天，我们家乡雨水过多，给生产带来了许多困难，一些秧田的田坎被冲垮了，大部分早稻秧苗回青缓慢。我们和贫下中农一道，苦干巧干，把冲垮了的田坎砌成石头的；同时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制成了



快速高效的有机化肥，促进早稻秧苗的迅速发育，为搞好生产打下了基础。

毛主席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有的人用旧眼光来看待我们回农村的行动，说什么“太没有出息”。什么叫“有出息”，什么叫“没有出息”？无产阶级认为，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这是最有出息的革命行为；反之，贪图安逸享受，追求名利地位，把个人利益摆在革命利益之上，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可鄙行为。我们坚决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回到农村干革命，这完全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怎么能说是“没有出息”呢！

把扎根农村干革命看成是“没有出息”，说穿了，就是把革命工作分成高低贵贱，轻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表现。革命工作有许多战线，不管哪一条战线，都是整个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什么高低之分，贵贱之别。当然，在现阶段，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相比较，农村和城市相比较，各方面条件都要差些。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我们为改变农村面貌而努力。我们承认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目的就是为了创造条件，一步一步地去缩小它，消灭它，而不是强化它，扩大它。如果不是这样去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让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支配自己，重工轻农，向往城市，鄙弃农村，那么，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就不会日益缩小，而只会不断扩大。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只能是重新出现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严重对立，回到工业剥削农业、城市掠夺农村的资本主义老路上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我们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这些轻视农村的错误论调进行分析、批判之后，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自觉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前不久，有个工厂想吸收我们中的一个同志进厂当工人，这个同志觉得：做工人阶级的一员是光荣的，在农村干社会主义，同样是光荣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务农和做工，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而回到农村来的，我们决心要在农村战斗一辈子，要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他的话表达了我们六个人的共同心愿。

几个月来，我们不仅在生产斗争中经受考验，更重要的是在阶级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的觉悟，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在部队期间，想的和做的都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和破坏作斗争。回到农村以后，虽然手中的钢枪换上了锄头、扁担，但这只是战斗阵地的转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有个同志回乡不久，发现本生产队一个地主分子经常煽动社员闹工分，用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破坏生产。于是，他深入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向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作了汇报。在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他和贫下中农一道，向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这个地主分子的破坏阴谋，使受腐蚀的干部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还有一个同志，他的几个哥哥都是学手艺的，过去受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经常不参加队里集体生产，外出搞副业单干。他回乡后，就在家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帮助几个哥哥认清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害，使他们不再外出单干，全队副业也很快纳入了集体的轨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从部队复员时，所以能够坚决地回到农村，主要是因为通过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加深了理解，提高了我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今后，我们要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中，进一步发挥冲锋陷阵的作用，继续革命不停步。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刻苦地、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四个多月来，我们一直坚持了看书学习，有时劳动很忙很累，但还是每天坚持一两个小时学习，并且注意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思考问题，用以指导实践。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使全国知道”**的指示，我们在自己认真学习的同时，还协助生产队办好政治夜校。我们决心**“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坚持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彻底破除旧的传统观念，为建设农村贡献我们的力量。



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 建军路线前进

柯 史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指明了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我军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四十八年来，我军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重重困难，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在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发挥坚强柱石的作用，就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为了完成我军肩负的重大使命，我们需要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一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无产阶级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绝对领导，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核心。党同军队的关系，只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绝对不容颠倒，颠倒了，军队就要变质。

毛主席在缔造我军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秋



收起义后，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时，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实行了党代表制，以后在营以上各级建立了党的委员会，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古田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军事领导政治”等错误倾向，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是在建军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总是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张国焘向党争个人兵权，分裂红军，危害中央，妄图以枪指挥党。高岗鼓吹“军党论”，煽动军队反党，妄图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上。林彪宣扬“军队中心论”，妄图篡夺党的兵权。他叫嚷什么军队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他妄想只要军队掌握在他手里，“党、政、民都有办法对付”。从这“对付”二字，可以看出林彪的狼子野心，他就是要把军队置于党、政、民之上，以枪指挥党，以枪控制政权，以枪镇压人民，从而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些反面教材，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贯彻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下，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党的路线的领导。“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兵可以有兵，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再丢掉。毛主席对我军的领导，集中地体现了党的正确路线领导。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就要一切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体现，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线，总是排斥毛主席对我军的领导。王明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夺了毛主席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结果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林彪反党集团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狂妄地提出人民解放军要由林彪“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完全是痴心妄想。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林彪一伙在党内和军内是极端孤立的，他们要想“指挥”、“调动”解放军干坏事，没有那么容易。正象过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破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都不能得逞一样，林彪也只落得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体现着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是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制度。毛主席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应当很好地结合起来。集体领导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分工负责可以发挥个人在集体领导下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具体任务。这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彭德怀要搞“一长制”，林彪叫嚷“个人负责制这方面要加以突出”，都是要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破坏党委的集体领导。“**支部建在连上**”，是实现党对基层领导的组织保证。党支部的建设，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林彪鼓吹什么“要以四好为纲”来建设连队，削弱以至取消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妄图把连队建设引向邪路，必须深入进行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自觉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倾向，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要进一步发扬。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少数人沾染了资产阶级派性，不讲无产阶级党性，不顾大局，不讲团结，这就不利于贯彻党的路线，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我们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充分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认真加以克服。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部队。

在我军初创时期，毛主席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一贯重视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部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都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近几年毛主席又一再号召：“**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几十年来，我军能够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保持优良的军政素质，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从做好军事工作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眼力不够，**



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我们要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既不过高或过低估计敌人，也不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正确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犯右的或“左”的错误。在实际斗争中，我们还经常碰到如精神与物质、人与武器、军事与政治、民主与集中、个人与集体等许多关系问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也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理论上搞清楚了，行动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倾向。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我军的指导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保证我军永不变质。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我军是无产阶级军队，内部成分比较好。但是，我们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侵蚀，必然要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部队中来。商品制度、货币交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也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思想。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众多的国家，现在小生产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还严重存在，也必然反映到部队中来。所有这些，都是产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产生修正主义的条件和土壤。为了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不断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林彪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拚命反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军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林彪一伙大量地狂热地推销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要我军读林彪的书，学林立果的报告，妄图以他们鼓吹的那套修正主义、孔孟之道取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



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加强世界观的改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否则，就不能识别林彪一类骗子，就分不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就会受骗上当。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这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出发点。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广大干部战士努力学习毛主席提出的这一建军宗旨，不断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直保持着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质，涌现出许多象张思德、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直保持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涌现出许多象董存瑞、黄继光那样敢于压倒敌人，而决不为敌人所屈服的英雄人物。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拒腐蚀、永不沾的优良作风，涌现出一些象“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的先进单位。这都充分体现了我军的宗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林彪反党集团则大肆鼓吹名利思想和活命哲学，主张“保官、保产、保命”，用“导之以高爵，养之以厚禄，任之以重权”来拉拢干部，培植死党，极力破坏我军的宗旨。现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早已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流毒还存在。我们要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肃清其流毒，使广大干部战士自觉改造世界观，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把反腐蚀斗争进行到底。

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关系着能否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两条建军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使列宁创建的苏联红军变了质，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其重要的手段，就是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林彪反党集团，也是这样，他们妄图用高官、厚禄、特权、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来瓦解我军的战斗意志，改变我军的建军宗旨。这些惊心动魄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

毛主席根据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为反修防修的重要内容，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例如：取消军衔，降低薪金，干部下连当兵、代职，实行野营拉练等，这对保持我军无产阶级



性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号召我军除打仗以外，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从事群众工作”，“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五·七指示》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军建设的全部内容，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也是坚持我军宗旨的重要保证。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继续沿着“五·七”道路走下去，使广大干部战士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自觉改造世界观，发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这三大任务，体现着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就要更好地执行这三大任务。

我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毛主席告诫全军：“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当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剧烈争夺世界霸权，苏修到处扩张，新的世界战争总有一天要爆发。国内已被打倒的阶级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一有机会，就要把他们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办好民兵，随时准备歼灭胆敢入侵之敌，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为此，我军必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组织指挥能力和战术技术水平。林彪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极力破坏我军的军政训练。他或以资产阶级的军事冲击无产阶级的政治，搞形式主义；或以资产阶级的政治冲击无产阶级的军事，搞取消主义。林彪的这些行径，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和部队指战员的一再抵制。近年来，我军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举办教导队，对初级干部实行传、帮、带。部队走出营房，实行长途野营训练。部队认真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军政训练取得了可喜成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在担负战斗队任务的同时，还担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在历次革命战争时期，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走到那里，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就做到那里；住在那里，开荒生产、助民劳动的任务就在那里执行。这样，既密切了军民关系，又锻炼了部队；既战胜了经济困难，又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条件虽然变了，但这个光荣传统决不能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作为一个工作队，坚决贯彻毛主席



的《五·七指示》，担负了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执行军事管制和军政训练的光荣任务，为人民立了新功，并使部队本身受到了新的锻炼和提高。林彪一贯反对我军执行三大任务。他除破坏战斗队的任务外，在战争时期，反对做群众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力破坏三支两军。他反对部队参加助民劳动和社会主义建设，恶毒攻击“五·七”道路。林彪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我军引向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邪路。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抵制了林彪的破坏活动，坚持执行三大任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胜利。

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增强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是毛主席建军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毛主席指出：人民解放军“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并强调指出：“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我军的内部团结，是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广大干部战士都是亲密战友和阶级兄弟，政治上一律平等，是一种新型的同志关系。这种革命团结，是无产阶级军队所独有的无价之宝。为了不断增强内部团结，我军坚持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坚持反对军阀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开展尊干爱兵运动；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自觉遵守革命纪律。正因为这样，在我军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干部战士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体现了我军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团结战斗的集体。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军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那就任何敌人也压不倒我们，而只能为我们所压倒。毛主席为我军确立了“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建军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经常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军处处爱护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把我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尽力支援军队。在战争年代里，军民同甘苦，共患难，军爱民，民拥军，同心协力，一致对敌。这种团结，使敌人



胆战心惊。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毛主席号召“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为了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要虚心向全国人民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使我军永远保持无产阶级性质，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使我军达到高度团结统一、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保证。毛主席指出：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要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方面，军队应该严格要求，作出榜样。

我军内部和外部的革命团结，是战胜敌人的力量源泉。一切革命同志，都应爱护这种团结。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团结，分裂我们的军队。林彪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妄图分裂我军，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加强革命团结。

四十八年来，我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走过了光荣的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在我军深入人心，一直占主导地位。虽然“左”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多次的干扰和破坏，但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任何野心家、阴谋家企图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改变我军的性质，都只能是枉费心机。但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仍然是长期的。充分认识和估计到这一点，就会促使我们加强反修防修的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

目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正在部队中深入开展。这次学习，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我们要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真总结我军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彻底肃清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学习中，我们要紧密联系部队的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现存的问题，把各项工作搞好。这必将大大促进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使我军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前进。



密切官兵关系的有效措施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党委会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指示，组织了部分师、团领导干部到连队和基层单位当兵。我们体会到：这是在军队内部人们相互关系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措施。它对于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保持我军的政治本色，加强部队的革命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为我军处理好内部相互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原则。在工农红军中，“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这种军队内的民主主义，这种同志间的平等关系，是我军区别于雇佣军队的显著标志。后来，毛主席又把“官兵一致”的原则定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反复强调“官长必须爱护士兵”，开展“拥干爱兵”活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军继承和发扬了这些光荣传统。为了在部队内部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毛主席号召干部要下连当兵。广大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使部队建设出现一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混进党内和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却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等级差别，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原则和措施。彭德怀推行“一长制”，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搬到革命队伍中来，妄图把人民军队变成他的一统天下。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贩卖“上智下愚”等黑货，反对官兵一致，反对军内民主，妄图分裂革命队伍，以实现他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就必须处理好军队内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实行官兵一致的革命原则，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坚持干部下连当兵的制度，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增强官兵团结，就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本质的一场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军事



路线的有力批判。

干部下连当兵，打破那种把社会分工绝对化的传统观念，批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密切了干部和战士的关系。干部战士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尽管分工不同，有的是指挥员，有的是战斗员，但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们军队的领导干部多数是从战士来的，扛过枪，打过仗，对我军干部战士之间的亲密关系有较深刻的体会。但是，在和平的环境中，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有的同志慢慢脱离了群众，滋长了“官”气，同志战友的感情淡薄了。这次干部下去当兵，一开始有的战士觉得，班里来了个首长，一切行动都不方便，谈心说笑都很拘束，见面必称职务，叫声老张老李很不习惯。这正好说明干部战士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干部下去以后，跟战士同吃同住同操课，争着担任公差勤务；外出请假，归队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战士生了病，给打病号饭；对战士的长处，虚心学习。这样，干部和战士增强了战友的感情。有的同志说：“当兵一个月，把当官的思想削了削。”我们师的一位副参谋长，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解放后，他学习了飞行，走上了领导岗位，二十多年没有在连队过过战士生活。这次下连当兵，使他想起过去行军打仗时干部战士亲密无间的情景。他象重新入伍一样，穿起工作服，跟战士一起擦炮涂油，打扫厕所，脏活重活抢着干。过了一段时间，战士们对他称呼变了，感情也变了，跟他“不外道”了。他回机关以后，战士还来找他谈心。很多干部通过下连当兵，同战士建立了无产阶级感情。实践证明，干部下连当兵，有利于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发扬我军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

干部到连队去过一过战士生活，看看战士们那种高昂的革命精神，有利于提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自觉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增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一位副师长到偏远地区的靶场去当养场兵，那里劳动强度大，生活比较艰苦。他对照战士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乐于吃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联系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看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自己的侵蚀，对过去讲排场、讲阔气、大手大脚批条子的作风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在下去当兵期间，认真学习战士吃苦耐劳的精神。场里种地瓜，他和战士一道挑水。战士们让他休息，他说：“挑担子我要不歇肩，劳动才能不忘本，汗水可以反修防修。”他回到机关以后，严格要求自己，注意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战士们高兴地说：“从干部身上看到了战争时期的那股革命劲头，只要保持这股劲头，就不会变修。”



干部下连当兵，也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过去有的同志坐在机关定方案，作计划，发文件，觉得头头是道。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亲自去干一干，就会发现有些东西是脱离实际的。有时工作不落实，并不是下面不努力，而是领导上官僚主义造成的。一个团的参谋长，过去机务人员对飞行计划有意见，他听了也不重视。他到机务中队去当兵，发现制订计划考虑实际情况不够，造成很多矛盾。后来，在制订飞行计划时，他和参谋人员一起研究，注意从实际出发，做到合理安排。经过下连当兵的干部普遍体会到，领导干部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亲自去干一干，才能跟群众有共同语言，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有效地改进领导作风。

领导干部下连后，基层干部和战士出于对领导的尊重和爱护，往往住房给好的，吃饭开小灶，干活派轻的，开会请你讲话，遇事向你请示。如果对这些安之若素，当兵也受不到锻炼。我们下去当兵的同志，都很注意端正态度，放下架子。劳动拣脏活累活干，公差勤务抢在头里，政治学习带头发言，遵守纪律一丝不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破除等级观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密切官兵关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师政治部主任在修理厂当兵时，和那里的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大家都愿意和他谈心。不久前他又到修理厂去蹲点，抓党支部的建设，由于当兵期间和战士们结下了感情，大家都愿意向他反映情况，所以问题抓得准，解决得也比较好，在工作中取得了主动权。干部下连当兵，也有一个传、帮、带的任务。但是，最好的传、帮、带，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理论学习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艰苦奋斗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实际的模范行动，往往更能起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而缺乏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夸夸其谈，指手划脚，即使是下去当了“兵”，也不可能起到密切官兵关系、改造世界观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在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干部头脑中的等级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不是当一个月兵就可以扫除干净。干部经过当兵的锻炼，在克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方面会有一些进步，但是过一个时期，又可能有反复。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官兵关系，要不断地进行调整。我们要坚决实行下连当兵这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不断地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进行斗争，发扬光荣传统，密切官兵关系，沿着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不断前进。



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洛阳”舰党支部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人民军队本质的生动体现。我军建立以来，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人民群众的哺育下，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我们舰能够在革命航程上不断前进，也是同经常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政治养分不开的。

我们舰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光荣军舰。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视察我们舰时，亲笔写下了“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光辉题词。二十多年来，它一直是鼓舞我们努力奋斗，加强部队建设的巨大动力。我们深深感到：要达到毛主席规定的目标，建立强大的海军，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课题，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什么时候注意向人民群众学习，什么时候部队建设就生气勃勃。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

去年年初，我们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些单位培养和建立工人理论队伍的先进经验，认识到这是人民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个创造，便立即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在舰上成立了业余理论学习小组。后来，我们又到上海第五钢铁厂等单位登门取经，使我们舰的理论队伍不断发展提高。我们业余理论小组的同志，学习工人阶级那种认真看书学习、深入批林批孔的革命精神，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写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为干部战士上了三十多次理论辅导课，推动了全舰的看书学习，促进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我们还从嘉定县新泾大队制订农业发展规划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根据我们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看书学习的规划，组织干部战士有计划地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掌握马克思主义



的基本理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还学习小靳庄的经验，在舰上组办和健全了文艺演唱组、图书室、书评组、体育组、赛诗会、故事会、政治夜校，用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这样经常注意向地方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部队的工作不断有所前进。

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是反修防修、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本色的重要一环。几年前，我们从海岛来到了大城市，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变了，但由于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干部战士仍然保持了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我们舰有一个战士，刚入伍时，带来了贫下中农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一双袜子补了几次还穿着。后来，他的思想有些变化，觉得住在大城市，穿破袜子太土气，还是穿尼龙袜子好看。一次回家探亲，父母和村里的贫下中农给他敲了警钟，再三嘱咐说：“你在大城市，可不能学起资产阶级的‘洋气’，丢掉我们贫下中农的‘土气’啊！”这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回到舰上后，他积极看书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一双袜子已经补了十三个补丁还穿在脚上。他说：“补丁垫脚立场稳，香风臭气吹不倒。”我们从这个战士的身上得到很大启示，认识到：干部战士虽然都是来自劳动人民，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如果不坚持经常向人民群众学习，原有的许多好思想好作风也会丢掉，也会有变质的危险。因此，我们经常组织干部战士到人民群众中去“回炉”。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请老贫农、老工人讲村史、家史、厂史和他们艰苦奋斗的事迹，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吸取政治营养。人民群众的好思想、好品质，是我们拒腐防变的“抗菌素”，自觉地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有利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把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保持和发扬下去。

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过程，就是对部队进行生动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过程。我们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抓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工厂、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是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老工人、老贫农，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经常请驻地工农群众给干部战士上课。同时，也走出去进行社会调查，了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今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干部战士到上海蔬菜公司等单位进行调查，了解资产阶级法权在货币交换中



的表现。同志们说：社会这个大课堂，老师多，教材广，我们学到了在舰上学不到的东西。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大课堂，广泛地接触群众，就能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路线觉悟，学得具体，教育深刻。

学人民，也是爱人民，为人民，实行军民一致，搞好军民团结的具体体现。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注意教育干部战士和那里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急人民之所急，帮人民之所需，学人民之所长。干部战士经常助民劳动，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这样，人民群众就更加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教育我们，爱护我们，从而真正做到军民团结，亲如一家。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把向人民群众学习经常坚持下去，关键是要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过去，我们舰有的同志认为，自己出身工农，有的刚走出工厂、农村，向不向人民群众学习关系不大。因此，往往只重视宣传群众，而忽视向人民群众学习。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多次发动干部战士批判林彪鼓吹的唯心史观和污蔑人民群众的反动谬论，使大家树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我们又联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军民关系问题上的表现，深入批判林彪把军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破坏军民团结、破坏我军谦虚谨慎等优良作风的罪行。在平时的政治工作中，我们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和两个阶级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大家认识到，军队是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还是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脱离群众，这是执行什么路线，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军队的问题。我们积极开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活动，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切干部战士都应当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即使是离开工厂、农村不久的同志也不能例外。为了提高大家的自觉性，我们经常组织同志们座谈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收获。当有的同志向人民群众学习取得了明显成效时，就组织他们介绍学习的体会。我们还利用政治夜校、黑板报等形式，宣传这方面的好典型、好经验。通过这些活动，激发大家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



情。

向人民群众学习和加强部队建设、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结合起来，才能经常坚持，取得实际的效果。上海造船工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利用在船厂修舰的机会，请工人师傅讲工厂的革命和建设，对干部战士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大家以工人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榜样，积极投入修舰工作，和工人共同努力，使修舰任务提前完成。我们还组织大家学习大寨大队和昔阳县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英雄事迹，找差距，鼓干劲，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建设，更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我们舰多数时间是在海上执行任务，接触人民群众的机会比较少。根据这个特点，除了建立学习点以及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法外，主要是抓住各种时机，利用各种方式，随时随地向人民群众学习，做学人民的“有心人”。我们经常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报纸上介绍的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这是天天送上门来的好教材。对参加工农兵讲师团的同志，我们要求他们虚心向工人、贫下中农讲师和革命师生学习。在海上执行护渔护航任务时，就利用帮助渔民抢修机器，为渔民治病，给渔民送淡水等机会，学习渔民群众为了多打鱼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战风斗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舰上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革命师生来参观，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人民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许多同志还利用外出工作、请假探家的机会，向人民群众学习。有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除了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还调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事迹，了解学校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并到生产大队理论小组参加学习。回到部队后，把在农村调查了解的情况和学习的收获，向同志们作了介绍，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

“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是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我们向人民群众学习，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党对我们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今后，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更加自觉更加经常地向人民群众学习，促进部队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发扬革命精神 做好革命工作

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

新 志 柏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里,许多同志都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今天,我们能不能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对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又是严峻的考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广大党员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许多同志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廉洁奉公,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地进行工作,始终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

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少数同志革命意志衰退,不求进步,比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追求名利,贪图安逸;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等等。这些同志对于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很热心,而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却表现很少兴趣。我们希望这些同志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还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呢?如果过去为党为人民出过力,流过汗,那么,现在是继续革命还是坐享革命之福呢?这是摆在这些同志面前应该认真考虑的尖锐问题。

有些人的革命意志衰退,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它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深刻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同志在农村坚持斗争,过着艰苦的大体上平均的供给制生活,大家一



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根本没有想到过拿薪水，更没有想到过要坐小汽车，住小洋房。那时，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为着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解放全中国，随时准备拿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解放初期，我们仍然保持着这些优良传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干部中发生不好的事情就比较少。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工资制代替了供给制，干部的生活待遇有了很大的提高。如果正确认识 and 对待这个问题，并不妨碍我们继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可是，有少数同志却丧失警惕，被商品和货币交换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他们考虑的不是如何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而是如何使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待遇越来越好，因而在他们身上滋长了官气、骄气、娇气、暮气、奢气，而革命的志气、朝气则一天一天地减少了。可见，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的腐蚀作用是很严重的。

有些人还把享受优厚的待遇看作是“心安理得”的事情。他们的“理”就在：我对革命有过功劳，人民应该偿我以高报酬。这正是把自己当作商品，搞等价交换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谁也没有考虑过要什么报酬。有些同志对革命有过一些功劳，或自认为有功劳而实际对革命的贡献未见得有多大，竟然伸手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这同革命先烈相比，怎么可以“心安理得”而不感到惭愧呢？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决不是为了追求多少资产阶级法权，恰恰相反，正是为了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虽然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全部做到这点，但要逐步去实现。如果把把我们这个最终要消灭的东西当作追求的东西，那就必然丢掉共产主义大目标，这还能算什么共产党员呢？

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看来，“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才是应取的态度。有了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和条件下，都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职务高了不会有官气，生活好了不会有娇气，年纪大了不会有暮气，工作变动了不会有怨气，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是不可征服的。什么“身体不行”、“工作困难”，什么金钱美女的引诱，在他们面前就象敌人的堡垒那样，总是一个又一个地被攻克。我们要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就要同那种“一切为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做到一辈子做好事，一贯的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西汉文学家枚乘，写过一篇有名的骚体赋《七发》，它对我们医治革命意志衰退症是颇有启发的，可以一读。这篇文章写的是吴国的客人去问候楚太子的病，直言不讳地当面对太子说，其病源是腐朽的生活方式，腐朽的生活方式又源于腐朽的思想，出入都坐车子是造成身体瘫痪的原因，幽深清冷的宫室是寒热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斫伤生命的利斧，美味的酒肉是腐烂肠胃的毒药。医治此病，药石针灸无能为力，只有用“要言妙道”才能见效。这些话值得我们借鉴、深思。革命意志衰退症也是一种思想顽症，靠打针、吃药、住医院是不能根治的。患这种“病”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

我们的许多同志之所以旺盛的革命斗志不减，艰苦奋斗的本色不变，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刻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且经常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不断地研究新事物，吸取新养分，从而保持了思想上的源泉。相反，那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多是不读书，不看报，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思想上死水一潭，久而久之，也就变得生锈了。

群众斗争的风雨是砥砺革命意志的磨石，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反修防修的课堂。患革命意志衰退症的同志千万不能把自己关在“安乐窝”里，要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搞一点调查研究，看一看群众在做些什么，听一听群众在想些什么。这样，视野就会宽阔起来，革命精神就会振作起来。同时也要尽量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许多坏事都是从不参加劳动开始的。养尊处优，容易使人蜕化变质。鲁迅曾经深刻地批判那些脱离劳动、“超俗”、“隐逸”的寄生虫，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如果也以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不干工作为快，“优哉游哉”，那同地主资产阶级还有多少区别呢？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更值得骄傲的高潮还在后头。我们每一个立志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都要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振奋起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继续革命，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破除外因论 自觉拒腐蚀

江景宏

干部和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进一步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但是，在反腐败斗争中，还有的同志认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社会上仍然存在，自己沾染上也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应当加以克服。

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真的是难以抵制吗？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少革命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万里征途不歇脚，革命斗志永不衰，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在商品、货币等花花绿绿的东西面前，心明眼亮，“糖弹”打不进，“香风”吹不倒，金钱不移革命志，艰苦奋斗不忘本。他们不仅做到“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还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打进攻战，立志缩小三大差别，以实际行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给我们做出了学习的榜样。

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难以抵制的观点，否认了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只强调外部条件，忽视内部原因，忘记了一个革命者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和革命责任，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

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人们思想、生活作风的发展变化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长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消除，资产阶级还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来腐蚀革命队伍，这是必然的。但如



果以此作为自己搞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一种理由，那就不对了。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与此相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它没有从内部的矛盾性上去把握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也就不能正确了解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为什么受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侵蚀的只是一部分人，而大部分革命同志则可以抵制它。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并不是对一切都发生作用的。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得比较好，头脑里无产阶级的东西比较多，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就能自觉地识别和抵制。相反，放松了思想改造，世界观上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王国”，当资产阶级的东西袭来的时候，就不能识别、抵制它，甚至还会欣赏、迎合它。这正是有的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下打败仗的原因。这样的经验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完全有条件去战胜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存在，虽然还有它的土壤和条件，但是，它和一切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样，是走向衰亡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弱的。我们有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有觉悟的人民群众，具备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优胜条件。不管经过怎样曲折的道路，无产阶级思想总是要逐步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也必然会逐步失去它的市场。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着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任务。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作斗争，并彻底战胜它，是改造客观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样的斗争中，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己反腐蚀的能力。因此，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面前，不敢斗争是错误的，斗争而软弱无力，也不能战而胜之。我们还必须看到，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具有很大的顽固性。它如同病菌一样，你不清除它，它就侵害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革命者应该发挥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反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断清除资本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保持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作风。

当然，我们强调内因的作用，决不是忽视外因。只讲内因，不讲外因，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是客观存在的，还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它对于人们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来说，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我们强调要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在思想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长城，从而使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影响不那么容易通过内因发生作用。

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刘少奇、林彪，鼓吹什么“闭门修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表面上看来，他们好象重视内因，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变化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主张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们反对革命的实践，反对在革命实践中去改造人们的思想。按照这样的认识路线去对待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根本不去和它作斗争，也不必通过这样的斗争增强自己抗腐蚀的能力。十分清楚，要是照这样去“闭门修养”，必然为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腐蚀，灵魂深处“爆发”的也只能是修正主义。刘少奇、林彪的反动谬论，完全是为他们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的。

辩证唯物论关于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一个革命者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拒腐蚀的自觉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我们观察社会、分析问题的思想武器。掌握好这个武器，积极地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才能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增强抗拒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侵蚀的能力。我们要坚持看书学习，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清除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侵蚀面前，做到拒腐蚀，永不沾，永葆革命青春。



领导要敢于负责

袁 青



毛主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动员广大群众实现党的路线的斗争中，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能不能以敢于负责的革命精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对带领群众改变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面貌，关系极大。

领导对工作负责，首先要抓大事，抓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保证。领导敢于负责，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之变成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个领导班子强不强，首先是看他们抓大事、抓路线的自觉性高不高。那里的领导班子坚强有力，领导干部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那里的工作就搞得有声有色，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得到充分发挥，革命和生产就蓬勃发展。这是被事实反复证明了的一条基本经验。

敢于负责，就要正视矛盾，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中，不能不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困难，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困难的基本态度。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要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矛盾总是不难解决的，任何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但是，在具体工作上，我们必须重视矛盾，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个一个地解决它。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工作不到，矛盾不会自己解决。胜利总



是用艰苦的工作和斗争换来的。如果只是在口头上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实际上回避和掩盖矛盾，不采取有力的措施去解决矛盾，就会使问题成堆，久拖不决，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

例如，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看起来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认真对待，其实并不难解决。无产阶级党性同资产阶级派性的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种反映。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安定团结，破坏革命和生产，是很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认清资产阶级派性的实质和危害，深入发动群众，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造成一个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强大的革命声势，同资产阶级派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多数人就会受到教育，很快地觉悟过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的人就孤立了，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兴风作浪的阶级敌人就彻底暴露了，革命和生产就向前发展了。消除资产阶级派性是这样，解决别的矛盾也是这样，关键在于要敢于正视矛盾，又善于分析和解决矛盾。在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敢”字当头，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革命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

敢于负责，就要坚持党的原则，同违背党的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党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是这样。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坚持党的原则，为社会主义把关，还是放弃党的原则，为资本主义开门，是各级领导干部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怕得罪人，不敢坚持党的原则，这是很错误的。“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事情总是这样，你要坚持党的原则，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得



罪”那些违反党的原则、搞资本主义的人。要所有的人都拥护，没有那个事。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进行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内部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人，领导坚持党的原则，进行适当的批评，是为了教育和帮助他，在他没有觉悟的时候，可能表示不满，但是，当他觉悟之后，就会同我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

坚持党的原则，是领导干部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带领群众前进的重要条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领导干部，就越是革命的权威。这样的干部，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带领群众大干社会主义。如果缺乏革命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在矛盾面前，左顾右盼，畏首畏尾，喜欢当“好好先生”，甚至利用职权，好行小惠，拿原则做交易，结果势必失去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样的干部，非但做不成什么事情，而且很容易被那些阿谀奉承、钻营利禄的人所包围，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那是很危险的。一个领导干部，敢不敢坚持党的原则，有没有革命斗争性，归根到底，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问题，是一个党性纯不纯的问题。

对于一个部门或单位的党组织来说，要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把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委的每一个成员，都要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抓路线，顾大局，讲团结，努力做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书记与委员之间，委员与委员之间，要经常地交流思想，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凡是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进行认真讨论，充分发表意见，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这样，领导班子才能负起责任，挑起担子，真正成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指挥部，才能有效地解决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



科 学 史 研 究

实践是农业科学发展的源泉

金 枫

农业科学是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对农业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同时，其他的实践活动也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研究农业科学发展的历史，不仅可以看到，人类怎样通过生产斗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而且可以看到，先进阶级的思想、先进的社会制度怎样推动了农业科学的发展，没落阶级的思想、腐朽的社会制度怎样成为农业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这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推动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迅速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劳动人民是农业科学的创造者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的出现，使人类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有了定居的条件，并为后来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那末，究竟是谁创造了农业和农业科学？是劳动人民创立的，还是上帝一手造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进行着斗争。

在远古时代，由于人们对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往往用神话加以说明。对于农业的创造发明，也是这样。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都



有神发明农业的传说。我国古代则有神农创造农业的神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这些神话的形式虽然是玄虚的，但其中包含着我们先祖同自然作斗争的客观内容。“神农尝草别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原始人识别各种植物，把野生植物驯化为农作物的过程。神农这个形象，则是以夸大的形式体现着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农业的集体智慧和力量。

到了奴隶制时代，奴隶主为了愚弄群众，维护他们的统治，宣扬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诗经》中就有“诞降嘉种”（《大雅·生民》）的说法，把劳动人民培育出来的作物，说成是上天的恩赐。在西方，基督教的《圣经》也说上帝创造了人和动植物。这些无稽之谈的共同特点，就是抹煞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伟大贡献，否定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对于这种神创论，我国古代的法家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汉代的唯物主义者王充指出，万千生物并不是天地创造的，“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论衡·自然》）万万千千手，只能属于劳动群众。农作物作为人工栽培的植物，正是劳动群众的万万千千手所创造的。后魏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记录了许多以人的姓名命名的谷物，如“魏爽黄”、“刘沙白”、“乐婢青”等等，也有力地否定了作物及其品种是上帝赐予的谬论。

当然，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还不可能科学地回答是上帝还是劳动人民创造了农业和农业科学的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根据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所提供的丰富材料告诉我们，在很久以前，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到了新石器时代，学会栽培秣草和种植谷物，开始了农业生产劳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在把野生植物驯化为栽培作物的过程中，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和试验，无数的失败与成功，积累了有关农作物生长规律的初步知识，并创造了简单的栽培技术，这就是农学的萌芽。

农业科学是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农业生产则是千百万劳动群众从事



的伟大斗争。离开了劳动群众的农业生产实践，农业科学根本不能产生，也不能发展。现在，我国农学的书籍留下来的不多，但就仅有的典籍来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科学上的创造也是很多的，至今还放射出光彩。他们不仅培育了黍、稷、粟、粱、菽、麦、稻等许多种类的粮食作物，而且适应不同的气候、土质等条件，在各类作物中又培育出很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品种。据《齐民要术》记载，公元六世纪我国单是粟就有八十六个品种，它们分别具有耐旱、耐水、耐风、免雀、抗虫等特点。其他作物品种也从少到多发展起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水稻有四万多个品种，小麦有两万多个品种。古代农书还记载了因时因地种植作物、深耕施肥、倒茬轮作、灌溉排水等一系列增产措施。如果不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初步认识了种子与作物的关系，作物与环境的关系，这些成就是根本谈不到的。

农业和农业科学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劳动人民是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创造者，驳倒了上帝或者“天才”创造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谬论。古罗马的加图、中国的贾思勰等人，在古代农学上之所以能够作出一定的贡献，并不是由于他们有超人的天才，而是因为他们总结了当时劳动群众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贾思勰曾经说过，他的《齐民要术》是在“采摭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齐民要术·序》）的条件下写成的。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农学家的理论无论多么精密，多么高深，都只能是“流”，它的“源”则是人民群众的农业生产实践。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他们的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靠不住的东西了。农学家要想对农业和农业科学有所贡献，就一定得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不断地从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汲取营养。

在生产斗争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围绕着人类能不能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问题，农业科学中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隶。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前者属于唯心主义，后者属于唯物主义。它们之间的斗争，在我国古代，主要表现



为儒家天命论同法家反天命论的斗争。

在我国古代，腐朽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儒家，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竭力鼓吹天命论。孔老二及其门徒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董仲舒鼓吹“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进步势力的代表法家则坚持革新，坚持进步，竭力反对天命论。他们认为，天并不是什么上帝、神灵，而是物质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这种对天的唯物主义认识的基础上，荀况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他认为，只要按照规律行动，就能“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这是对儒家天命论的有力批判。

儒家天命论同法家反天命论的斗争，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部农业科学史，不但是劳动人民战胜大自然的历史，也是人定胜天思想战胜天命论思想的历史。

人类能不能认识农业生产的规律性呢？几千年来的农业生产实践做了肯定的回答。拿天时来说，儒家认为它是上天授予的、决定农作物生长衰亡的十分神秘的东西，人类无法认识它。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随着农业生产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种植庄稼因时制宜的重要，摸索到不同作物不同品种的播种适期。为了适时地安排各项农事活动，为农作物的生长争得有利的天时，人们通过长期对日地关系的观测，逐步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从把一年分为四季到分为二十四节气，人们对天时运行规律的认识显然是更精确更深刻了。不仅如此，人们在生产劳动中还逐步认识到，所谓天时，对农业来说，不过是一定的光照、气温、湿度等条件，在什么程度上控制了这些条件，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控制了天时。早在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就根据这样的认识创造了温室栽培技术，成功地在冬季栽培出春夏生长的蔬菜。这是古代农业上的创举，是人们认识和控制天时的发端。

在土壤肥力问题上，法家荀况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经验，提出“多粪肥田”的主张，指出：“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荀子·富国》）只要能够“善治之”，土壤就会由瘠变肥，产量就会由低变高，甚至一年可以收两季庄稼。后来王充更明确地认识到，“深耕细耨，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这些观点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有力地批判了儒家



鼓吹的土地肥饶天赋论。

在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命论影响下，我国农学史上曾流传过唯风土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古代各地所宜种植的谷物种类是不能改变的，人们只能因循守旧，按以前定下来的作物区划种庄稼。然而，富于革新精神的劳动人民不断打破这种守旧复古的谬论。我国汉代已经从西域引进了苜蓿、葡萄，元代棉花从边疆引进内地，明清两代番薯从南方逐步引种到黄河以北。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培育出种类繁多、品种各异的农作物，把大地装点得色彩缤纷，绚丽多姿，大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在农学领域中，十三世纪就有人批判唯风土论。明末尊法反儒的农学家徐光启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果若尽力树艺，殆无不可宜者”（《农政全书·农本》）。他还肯定了“人力之至，亦或可以回天”（《农政全书·树艺》）的说法，进一步把关于风土论的争论，提到天命论与反天命论斗争的高度。

劳动人民具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无穷力量。但是这种力量究竟发挥到什么程度，总是受着社会制度和政治路线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建立，劳动人民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在法家路线的推动下，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出现了一个大发展时期。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畜耕的逐步普及，显著地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为战胜自然灾害、夺取农业丰收创造了有利条件；畦种法、代田法、区种法等先进栽培技术的出现，有机肥料的广泛使用和施肥技术的进步，形成了我国独有的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这一切，使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在整个古代处于世界的前列。但是，封建制度的建立，毕竟只是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且它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的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真正做了大自然的主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只有在这时，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力量才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和规模改造自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劳动人民以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向大自然开战，重新安排祖国河山，正在谱写出一曲曲人定胜天的凯歌。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胜过了以往一切时代，每一项成就，都是人定胜天思想对反动的天命论的胜利。当然，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旧社会的痕迹、旧思想影响的存在，天命论还会有，还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是“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对农业的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培育有生命的农作物。任何一种农作物本身都有许许多多属性、特质，都有它自己的生长发育规律，以及跟自然环境十分密切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在农业生产中，人们面对的不仅有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运动，而且有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认识农业生产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事物，需要有一个反复的认识过程。

列宁在谈到认识的发展时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人类对农业生产规律认识的深化过程，也是按照螺旋的曲线发展的。在土壤和农作物的关系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条认识的曲线。

古代的人们坚持一种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初步觉察到农作物既能消耗土壤的肥力，也能提高土壤的肥力，意识到土壤和农作物之间的物质交换，即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这种认识，曾经创造了粮食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各种不同的粮食作物的轮作制度，以提高土壤肥力。但是，由于这种认识缺乏精密的自然科学的根据，到了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思想代替了。在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影响下，对于植物与土壤的关系，西方曾流行过所谓“生活力”学说，认为植物的营养不是从外界摄取的，而是借着“生活的作用”自己制造出来的。继起的“腐殖质”学说，承认植物要从外界摄取营养，但认为这种营养只能是腐殖质——有机物。这两种观点都不承认土壤和植物相互转化的关系，既不承认土壤向植物供给矿物质养料，也不承认腐烂、分解了的植物会变为



无机物，变为土壤的一部分。

在这种凝固、僵死的观点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一八四〇年，李比希总结了农业化学的成果，提出矿物质是植物营养基础的新观点，在农学领域打破了有机界与无机界的形而上学界限，向辩证法前进了一大步。他认为，栽培作物消耗了土壤中的矿物质养分，因而必须施用无机肥料，把消耗的部分归还给土壤，才能保持土壤的肥力。李比希的理论有力地批判了“生活力”和“腐殖质”两种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人类有意识地调节人与土壤之间物质交换的思想，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土地掠夺式经营的恶果，促进了用化学方法对土壤和植物的研究，推动了化肥的广泛施用以及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肯定地评价了李比希的理论。

但是，李比希只看到土壤对农作物供给养料的作用，没有看到农作物对土壤形成、土壤肥力提高的作用。就是说，在土壤和农作物之间，他只看到单方面的转化，没有看到相互转化。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土壤与植物这一对矛盾也是处于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土壤学家威廉斯吸取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前代土壤学家的成果，正确地指出，生物是自然成土因素中的主导因素，植物群落和相伴微生物的不断更替，决定着土壤种类的更替和土壤肥力的发展。风化了的岩石只是土壤的母质。在没有植物的情况下，土壤母质中的矿物质养料，会在淋溶过程中流失。只有植物的根系才能“捉”住这些养料，把它变成自身的组成部分而保蓄起来。另外，一些相伴微生物还能把空气中的氮素吸收、固定于土壤母质之中。植物死亡分解之后，营养物质留在母质里。经过生物世世代代的累积，土壤母质中的养料不断增加，土壤肥力不断提高。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植物就没有土壤的肥力，没有土壤本身。威廉斯根据这个理论，阐明了农林牧之间的密切关系，把农业、林业、牧业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制定了恢复土壤肥力的草田轮作制，对于发展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农业作出了贡献。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推行资本主义掠夺式的农业经营方式，把根据威廉斯的理论取得的一些成就，已经几乎搞光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



以后，在农村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虽然名称未变，实际上已经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变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富农所有。这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特别贪婪，他们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二十多年来，对土地一直实行掠夺式的经营，一会儿盲目地大量开荒，一会儿废除草田轮作制，加上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造林护林的投资不足，造成土地肥力的严重破坏。据报道，仅哈萨克斯坦全部被开垦的土地每年因风沙受害面积就在二千万公顷以上，乌克兰农业用地约有三分之一因水蚀而变劣。结果，使粮食播种面积日益减少，产量下降。在勃列日涅夫当权以来的十年间（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就有六年减产，一个历史上粮食出口的国家竟不得不经常靠进口粮食过日子了。

马克思指出，土地“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人的生产劳动是成土的重要因素，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由于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不断摸索土地由瘠变肥的规律，运用深耕、细锄、施肥、灌溉、轮作等措施促进土壤的熟化，注意用地和养地相结合，就总的趋势来说，几千年来我国土壤的肥力是不断提高的。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多年来大寨大队改土的实践证明，人们认识了土壤的运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丰产的需要来改良土壤，可以实现土壤在自然状态下要千百年才能出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变革。

人类对农作物和土壤关系的认识，就是这样从朴素的辩证法观点，经过形而上学观点，进到科学的唯物辩证法观点。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是一个螺旋式的发展过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对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制定了农业“八字宪法”，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土、肥、水、种、密、保、管、工是使农作物增产的八个基本因素，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农民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因地制宜地全面贯彻了农业“八字宪法”，实行农林牧结合，用地和养地结合，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结合，使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得到合理的综合应用，创造了大面积的高产、稳产田，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量



的提高。

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

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说在农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资产阶级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永恒性，工人阶级饥饿贫困的合理性，一直在宣扬农业生产到顶，饥饿威胁人类的谬论。十八世纪末马尔萨斯鼓吹的“人口论”，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宣扬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以及当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辩护士们所散布的亚非拉“人口爆炸”，“世界粮食危机”等等，都是这种反动观点的不同腔调。

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四年就指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毛主席也指出：“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土地的肥力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几千年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夺取农作物更高产量的历史。土壤的改造，各种肥料的施用，农田水利设施的进步，优良品种的培育，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栽培技术的改进，新机器新能源的利用，等等，都推动着并将继续推动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在，科学技术的现有成果远远没有充分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来，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上述推动农业发展的各个因素都有着无限的潜力和无限前途，永远不可能到顶。在这里，一切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炮制“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们抛开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状况，抽象地谈论什么“追加劳动和追加资本”，不可避免地做出荒谬结论。其实追加的劳动和资本总是伴有新机器、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技术革新和生产力提高。因此，列宁指出：“‘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完全不适用于技术正在进步和生产方式正在变革的情况”。这种所谓“规律”，不过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破坏农业生产的种种罪恶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内，它们的农业衰落，矛盾重重，其



根源并不在于“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而在于那个罪恶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农业的每一种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并且也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每一种在定限时间内增进土地丰度的进步，都同时是破坏这种丰度的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干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勾当，如掠夺地力，破坏自然资源，使作物品种过分单一化等等，给农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在苏联中亚地区实行掠夺式的开垦荒地，造成了“黑色风暴”，也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丑闻。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往往要销毁大量粮食，让农田大面积地荒芜起来，使农业生产遭到更严重的破坏。这一切都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什么“人口过剩”，“粮食不足”，完全是一派胡言。资本主义世界的所谓人口过剩，不是象英国牧师马尔萨斯宣扬的那样因为人口多了，食物少了，恰恰相反，粮食生产并不少，只是工人的购买力太低，消费的粮食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依然喋喋不休地胡说什么“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人口太多”。这是新殖民主义的谬论！地球上真是人口太多了吗？地球表面大约有土地二千多亿亩，可耕地约占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按百分之四十算，约九百亿亩，世界现有耕地约二百亿亩，不到可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世界的土地不是太少，而是远远没有充分利用。人满之患从何而来？其实，比较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密度有的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非洲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十二人，而美国则有二十二二人。怎么能说这些地区是地少人多造成了贫困呢？

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粮食问题不是别的，恰恰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长期侵略的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勤劳，土地肥沃，只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本来是可以丰衣足食的。可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地区进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强迫实行畸形的单一经济，进行不等价交换，使这些地区民族经济得不到发展，粮食不能自给，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继续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剩余”农产品，严重摧残了亚非拉国家的农业生产。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超级大国仍在不同程度上控制它们的经济命脉，采用新殖民主义的形式，继续剥削和掠夺，致使许



多发展中国家无法积累资金，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当前美帝大力推行、苏修拚命鼓吹的所谓“绿色革命”，就是在“解决第三世界的粮食问题”的幌子下，以“援助”为名，行侵略之实的一种新殖民主义策略。

粮食问题首先是社会政治问题，只有进行革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才能真正解决。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是一个真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反动统治以后，我们党领导亿万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在农村实现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这就为大规模改造自然，为农业机械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广大农村蓬勃发展，全国亿万贫下中农战天斗地，治山治水，使农业生产出现连年丰收的大好形势。从黑龙江畔到五指山麓，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实现粮食自给有余，初步扭转了南粮北调。全国解放二十五年来，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二十五年前，当我国民主革命刚刚取得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断言，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只有向他们乞讨才活得下去。他们的预言完全破产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同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重重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没落下去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农业科学也有了飞跃的发展。一个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贫下中农、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的农业科技队伍日益壮大，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大量涌现。当前，广大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教育和锻炼，进一步掌握了唯物辩证法，更加解放了思想，增添了干劲，这必将使农业科学更加普及深入地向前发展。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曾经为世界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飞速发展着的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科学，要争取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 杂 文 ·

苏修鼓吹“三不”主义的目的何在？

秦 景 池

今天的苏联，是一个商品拜物教的世界。只要一打开苏修的书报杂志，触目尽是讴歌商品、货币的论著。一九七四年，莫斯科出版的某博士写的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的一本。

这部《政治经济学》，鼓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会出现商品生产者的剥削，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不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而言之，可以谓之曰商品生产上的“三不”主义。这个“三不”主义的核心，就是企图通过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私有经济的遗迹，否认商品制度仍然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否认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为复辟了的苏联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贩卖的到底是什么货色。

一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其他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但是，由于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有着少量的个体所有制的残余，商品制度就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它依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列宁在分析当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商品生产的时候，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苏修叛徒集团为什么对于列宁这些科学论断视若无睹？为什么不敢于公开引用这些论断？既要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打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苏修叛徒集团在这里又一次作了充分表演。其所以如此，无非是妄图证明他们那个



冒牌的社会主义是“真的”，他们那里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虽然用心良苦，但稻草不仅没有捞着，反而徒然暴露了自己的叛徒嘴脸！

二曰：商品的等价交换不体现资产阶级法权，而是体现着所谓“经济平等”。

苏修御用文人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特点，“是商品等价关系成为商品生产者同志式合作关系的形式”，“通过等价交换达到经济平等”。商品等价交换中所体现的那种经济平等，难道不正是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吗？马克思不正是根据按劳分配中“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因而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的吗？等价交换中的“价”，指的是商品的价值，它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而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必然会在商品生产者之间引起两极分化。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就是从这种分化中产生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收入的差别。如果不加限制而任其扩大，就会造成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苏修叛徒集团把等价交换的平等权利当作“同志式合作关系”的体现，这正证明了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的最高理想。

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一小撮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叛徒，疯狂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苏联从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今天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公开收入就比一般工人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至于他们不公开的非法收入更是难以计数。苏修政治局委员的别墅，“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配备的家具是从芬兰进口的，有游泳池、网球场、体育设备和带有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品的俱乐部”。而广大苏联劳动人民则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材料，现在需要领取“经济困难家庭子女补助金”的人有二千五百万，即占全苏联人口的十分之一，实际人数当然远不止这些。残酷的剥削，悬殊的收入，早已引起了苏联劳动人民的不满。所谓“经济平等”和“同志式合作关系”，无非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苏修版，实质上不过是掩盖剥削关系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三曰：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已不能成为剥削他



人劳动的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经济学家既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拿不出什么证据，只能乞灵于一本名叫《金色的牛犊》的苏联小说。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骗子手别恩杰尔在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忽然领悟到：“在苏联，绝不能拿这些钱来作为资本。”苏修经济学家竟然把这位骗子手领悟的“道理”一本正经地写进了他们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之中，当作在苏联“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论据。对于这种胡说八道，人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其实，这位别恩杰尔的百万家财是通过诈骗得来的，归根到底，也就是靠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得来的。象别恩杰尔这样的百万富翁，正是今天苏联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首的一小撮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的逼真写照。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日的苏修《真理报》有一篇小品文，它透露出来的情况，就打了这本《政治经济学》一记耳光：土库曼有个总工程师苏尤诺夫，拥有自己的牧场，养了大量的骆驼和绵羊、奶牛，需要坐上包租的直升飞机巡视畜群，并且雇工替他放牧。苏修叛徒集团能够否认苏尤诺夫的万贯家财就是他的资本这个事实吗？这万贯家财难道不正是苏联工人、农民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吗？百万富翁本身，实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苏修经济学家妄想用一个通过诈骗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的“领悟”来否定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真是天大的笑话。

列宁在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时候明明白白地指出：“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苏联自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党政大权以来，所有制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农庄里面实行着对广大工人、农民实际的雇佣劳动制度，这难道不正是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的铁证吗？

理论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的。苏修经济学家鼓吹“三不”主义，目的无非是为了欺骗苏联人民，掩饰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但是，尽管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死死地抱住社会主义招牌不放，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早就蜕化变质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也早已蜕化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了。苏修经济学家声嘶力竭地叫嚷他们那里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只能暴露他们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辩护的嘴脸。事实毕竟是事实，黑的不能说成白的，越要粉饰就越显出其丑恶。

